

黑龙江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龙江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刘文新

封面设计：蒋 明

封面题字：周慧珏

黑 龙 江 文 史 资 料

第 四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铅印室印刷

黑 龙 江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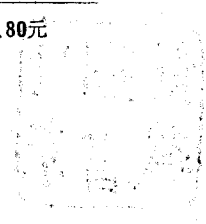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8 12/16 字数162,000

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统一书号：11093·97

定价：0.80元



目 录

深入匪巢争取改编“庄稼人”匪队纪实	张瑞麟 (1)
回忆老畜儿窝棚战斗	王明贵 (21)
夜袭霍龙门	王明贵 (27)
土龙山农民暴动纪实	刘泽夫 (38)
赵尚志军长指挥我们杀日寇	张 祥 (51)
李兆麟同志和我们同甘共苦	张 祥 (58)
大年初一的一场战斗	李 敏 (65)
回忆关化新同志二三事	李延新 (75)
回忆抗联第三路军第九支队西征片断	马广荣 (85)
不做亡国奴	李义民 (106)

长征路上（续）

.....夏振栋（121）

回忆军阀混战中的几件史实

.....刘鸣九 荆有岩 王肇治（134）

黑龙江省学生同盟会员革命活动片断

.....李铭新（145）

黑龙江辛亥革命纪略

.....吴文銮 李桂琴（153）

哈尔滨市政权收回和哈尔滨特别市成立始末

.....林斯贤 李述笑（163）

解放前东北的高等医学教育

.....拟元翼（179）

庚子俄乱目击记

.....姜万昌（192）

回忆中国第一批女航空员的成长

.....王忠瑜（197）

唐代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

.....陈青柏（205）

深入匪巢争取改编“庄稼人”匪队纪实

张 瑞 麟

一九三七年“四一五”事件哈尔滨地下党组织遭到大破坏以后，我失掉了党的组织关系。在继续坚持地下斗争期间，我曾先后三次派人到海伦县、拜泉县、阿城县玉泉打石场和河北省交河县寻找党的组织，但都落了空。一九四〇年农历六月的一天，我和常佐臣离开生活、战斗了八年的哈尔滨，徒步奔向肇东县方向，去寻找一支称做“庄稼人”的小土匪队伍，意在深入匪巢，开展政治争取工作，使他们迷途知返，改邪归正，参加抗日队伍，投入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

在我革命的征途上，如果说一九三三年因为负伤，经满洲省委决定，我忍痛离开南满游击队，离开如火如荼的对日斗争第一线，在白色恐怖下进行地下党的秘密斗争，是一次大转折的话，这次离开哈尔滨，无疑是又一次新的转折。从争取改编“庄稼人”匪队开始，我又直接投身到东北抗联队伍中，和我亲密的战友们转战在祖国北疆的战场上，一直战斗到迎来祖国黎明的曙光。

一、找关系打入匪队

我这次离开哈尔滨，去“庄稼人”匪队做政治争取工作，目的明确，信念也很坚定。但由于对这小股队伍的底细不清，能否争取改编成功还在两可之间，因此，这是一次冒着危险的艰难历

程。

关于“庄稼人”匪队的信息，是常佐臣去海伦、拜泉寻找党组织落空，回哈尔滨以后，听他的同乡王庆发说的。他们在一次闲谈中，王庆发说在离他家不远的肇东县南江沿一带，有一小股武装部队，他们也打日本鬼子，日军虽多次出动打他们，但由于这股小部队武器较好，打起仗来挺厉害，又加上神出鬼没，日本鬼子到底没治了他们。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常佐臣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以后，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当时就想到，这会不会是一支和主力失去联络的抗日队伍呢？如果真是那样可太好了，只要找到这支队伍就能找到党组织。可经过我和常佐臣仔细一分析，觉得这种可能性极小。因为只要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就绝不会干抢劫、绑票这类土匪勾当。它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队伍呢？

想起“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的铁蹄全面践踏我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把东北军阀的主力部队都调进关内。剩下马占山、苏炳文、丁超、李杜、唐聚五、冯占海、王德林、邓铁梅等数股具有不同背景的力量。这些部队的广大官兵受东北人民风起云涌的抗日声浪的影响，激起了爱国热情，纷纷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就连那些自恃一方、横行霸道的地主武装，为了保住武器，也紧赶抗日浪潮，打出抗日“自卫军”、“救国军”之类的旗帜。一时间似乎抗日声威大震，很是一番热闹景象。

这些队伍虽有武装，也只是有武装而已。他们眼里没有群众，不懂得发动、团结广大群众作为后盾，壮大自己的力量。他们各股力量之间，更没有统一的指挥、统一的领导，而是各自为

政、各自为战，形不成巨大的力量。“抗日救国”的口号喊得震天动地，但对日军战斗次数很少。相反却以功臣自居，军阀习气、土匪作风有增无减，很快把广大人民群众推向了己方的对立面。马占山、李杜、冯占海、苏炳文等较大一些的部队，对消灭日寇、光复国土，也丧失了信心和决心，带着悲观失望情绪，陆续进了关。其余那些小股的这个军那个军，没有多久，绝大部分都溃散了，个别的投降了敌人，成为日寇侵略我国的帮凶，不齿于民族的败类。有些虽不甘于认贼作父，但由于日寇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推行保甲制度、十家连坐，特务汉奸无孔不入，这些有“抗日”嫌疑的人，就是真心想回家当“良民”也不得安生，被逼无奈，只好上“梁山”当土匪。这小股武装队伍很可能就是这样聚合起来的。

如果是这种情况，这次政治争取工作便面临着很大危险。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民族解放事业，如能把这支土匪队伍争取教育过来，改编为抗日队伍，壮大抗日力量，别说去冒险，就是流血乃至牺牲，对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应该的、值得的。同时我也相信，即便是不折不扣的土匪，它的成员总还是中国人。他们打日本的实际行动，表明了他们还具有民族的气节、进步的因素。只要对他们进行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讲清民族大义和亡国的利害，他们是会被感化、争取教育过来的。我又有一九三三年与曹国安、宋占祥一道在烟筒山发动伪军迫击炮连起义的经验，因此，当我和常佐臣最后商定冒险深入匪巢的时候，也觉得心里有底。

我们这次的行动，事前经过周密的分析，下定了决心，义无反顾。我和常佐臣说，不争取成功就不能回来。走前，我对未来

做了长期打算，用我做工挣的钱和在小鞋铺入的股金买了一些衣服、鞋袜和生活日用品，包了一大包子，随身带上。

为了避免在火车上被特务盯梢，我们决定不坐火车，徒步前去。出发那天，我俩起早在江北马家船口会合后，就直奔肇东县三站区南边的小蒋家围子，先去找王庆发。

到王庆发家，天已经大黑。常佐臣向王庆发夫妇介绍我是“老张大哥”。晚饭后，我们一起唠嗑，常佐臣有意把话题引到小股武装部队上来，以便进一步了解情况。

王庆发说这小股武装队伍就是“吃打饭”的匪队（“吃打饭”是土匪行话，土匪的代名词）。正如我们分析的那样，这些人因为从前曾参加过各种杂牌“抗日”军，在家呆不下去，是被逼出来“吃打饭”的。现在大约有三、四十人。由于他们的头头大掌柜号称“庄稼人”，“庄稼人”就成了这支匪队的代号，一提“庄稼人”，这一带的人都知道。

听了王庆发的介绍，我试探地问要找“庄稼人”匪队好不好找，并说我想去参加，不知能不能行。听说我也要去“吃打饭”，王庆发有些惊奇了。看他的神情，显然对我是不是好人产生了怀疑。

我早就从常佐臣那里了解到，王庆发是一个普通农民，是他在双城县居住时的邻居，为人忠厚老成，没有坏心眼。他们又是结拜盟兄弟，因此我并不担心王庆发会危害我。但为了消除这位老实人的怀疑，为了他能支持我，帮助我达到目的，我必须把实情告诉他。我说：我去找“庄稼人”，并不是真心去当土匪，危害百姓，发财致富。我是想深入到小部队里，做工作，团结、教育、争取他们一道投奔抗日队伍，走抗日救国的道路。常佐臣也从旁

边帮助解释。王庆发夫妇听后，如释重负，表示非常赞成，说这才是有良心的中国人应该干的事。他说他们这个屯子的刘家老三刘胜武就在“庄稼人”队伍里“吃打饭”，还是个小头目。刘老二和刘老疙瘩都还住在屯里，与刘胜武没断联系。我委托王庆发找刘家哥们儿给说说，希望通过他们给牵个线，并能带我们去找“庄稼人”。王庆发说这能办到。

第二天王庆发就去找刘老二，和刘老二一说便妥。王庆发就领着他来见我和常佐臣，我把我的意图和想法又给他讲了一遍，顺便又向他宣传了一番抗日救国的道理。刘老二对我们说：胜武出去也是迫不得已。谁不知道“吃打饭”名声不好，说不定哪一天掉脑袋。这个世道反正不能安生，认可“吃打饭”掉脑袋，也不能等着挨抓挨杀。“吃打饭”也就是图个一时逍遥自在。胜武早就知道在那儿常混下去没有出路，想着另找条道。这次张大哥来，拉着他们走抗日道路，他准能愿意。明天我就去找胜武，你等着听信吧。

过了两天，刘老二果然高兴地回来了。他说经过刘胜武的活动，二掌柜宋志生（号草上飞）是没问题了，大掌柜也露了活口，希望我去面谈。我和常佐臣听了也很高兴。当天吃过晌饭，就背上衣服包，随刘老二一同上“庄稼人”匪队去了。

我们出了小蒋家围子，直奔南江沿。走了两个来小时，来到松花江边一个秘密上船地点。在那里等了半小时左右，只见从江心岛树林边划过一只小船，划到我们跟前拢岸。我们仨上船后，划船人把我们划回江心岛上岸，带领我们穿越树林、草莽，来到丛林深处。那里搭着五、六个草棚子，这就是“庄稼人”匪队的“营地”。

二、结拜盟兄弟，以退为进

我和常佐臣跟随刘老二直接来到二掌柜“草上飞”住的草棚里，先和“草上飞”见了面。随后“炮头”（即队长）“青山好”、“水箱”（即司务长）刘胜武、“秧子房掌柜”（即专门看管被绑来的“票”的人）孙景彬，还有一个很年轻的人叫刘鹏飞（后来了解到他是从哈尔滨王岗日本航空队开小差出来的），陆续聚拢到二掌柜这个草棚里。

刘老二把我和常佐臣向他们一一做了介绍。大家寒暄了一阵子，我又自我介绍了一番，然后我就开腔说起来。我说：“今天当着各位弟兄，咱们真人不说假话。我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人，因为执行任务，现在哈尔滨暂住。听说你们在这一带活动，今天我特意来拜访大家，和弟兄们共同商量抗日救国的大事。”说到这里，我察看了一下他们的情绪，感到他们听得都很认真，没有反感的表示。我想，这是一个做宣传、争取工作的好机会，既然他们愿意听，我就多给他们讲一些。当时，我恨不得把自己知道的革命道理、抗日战争的情况都讲给他们知道，一下就争取成功才好。

我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企图进一步侵吞全中国，讲到中华民族将要沦为奴隶、当牛做马的悲惨命运，从中国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分民族，不分信仰，团结起来，和日寇决战到底，把日寇赶出中国，才能解放全中华民族，讲到我们祖国和人民美好的未来——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旧制度，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过上自由、平等、幸福、愉快的新生活。我说：“现在有爱国觉悟的中国人，已经行动起来了。关里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的十一大抗

日联军队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同日寇和国内反动派进行着坚决的斗争。这样的队伍，为祖国的解放而战，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打骂群众，因此受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爱戴和拥护。我们每个参加这个队伍的人都感到前途无限光明，我们每个人的历史也会记上光荣的一页。现在各位弟兄们‘吃打饭’，东奔西跑，有家不能归，父母、妻儿离散，还要给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增添痛苦，让人唾骂。走这条路前途暗淡、历史无光，对不起父老兄弟，也对不起子孙后代。就算是你们打鬼子，靠少数人，势单力孤，东捅一下，西捅一下，伤点皮毛，动不了筋骨，解决不了大问题。两相比较，我们为什么不走光明大道，非要往死胡同里走？”他们听我说的在理，都点头称是。这时二掌柜接上说：“‘吃打饭’的都是穷人，有钱有势的人没有干这种遭罪又危险的事的。”

宋志生说完就出去了，过了好一阵子又回来，明显地表现出闷闷不乐。他把我叫出去，先是诚恳地表白他要走抗日道路，然后告诉我：大掌柜对我有些怀疑，不相信我真心要在这里“挂住”（土匪行话，站住不走的意思）。大掌柜说：“‘吃打饭’的人没有不要东西不要钱的，不为钱财也罢，也没有带着东西来参加的。”大掌柜还对二掌柜说，要加小心，提防日本特务混进来。

大掌柜的态度使二掌柜很有些为难。我的心头也蒙上了一层重重的阴影。此时我想的不是能不能在这里“挂住”的问题，而是如果我被怀疑是日本特务，那就一下子把我置于极端的境地。事情很明显，我这一来，他们的情况我都摸清了，这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利的，他们一定会想对策对付我。

我没有惊慌、害怕。危险吓不倒我。当初决定打入匪巢，做了各方面的思想准备。我决心用一个共产党员对祖国人民的赤胆忠心，用党和人民给我的智慧和勇气，全力化险为夷，争取他们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我又冷静地分析了一下面对的情况。我到“庄稼人”匪队这短短的时间，所接触的人除了二掌柜以外，其他多是小头头，对我都表示有好感，也表示愿意走抗日救国的道路。二掌柜是匪队中的主要人物，他带来的武器比大掌柜的多，在弟兄们中间威望较高，大家愿意听他的话。他对我没有怀疑，对改编问题态度积极明朗。他不但可以影响大家，而且可以继续帮我做大掌柜的工作，保证我的安全。利用这些条件，做好工作，完全可以逢凶化吉，争取主动。

根据我过去所了解的情况，“吃打饭”的这帮子人，浪迹江湖，活过今天不知明天会怎样。为了苟活、生存，往往最重哥们儿义气，把大家拢在一起，抱成一团。我拿定主意，在这关键时刻，抓住他们这个特点，提出和他们拜把子结为盟兄弟，靠这一招争取在这里先站住脚。

时间紧迫，在众目睽睽之下，没办法也没时间同常佐臣商量，我就拉着二掌柜又回到草棚里。我对大家说：“我这次一心一意投奔各位弟兄，没有一点歹意，没想到大掌柜对我还不了解。看来我留在这里是不大可能了。至于原来打算带弟兄们弃暗投明，共赴国难，眼下不行，就得往后搁一搁了。我这趟不算白来，有幸和弟兄们相识，交个朋友，一块商量抗日救国的大事，机会实在难得。这次我们虽然还不能走上一条抗日救国的道路，但我相信这是暂时的。我们都是中国人。我已经看出来各位弟兄都是有爱国心、有正义感、讲义气的人。现在大敌当前，国家、民

族处于危亡之中，各位弟兄是不会眼看着亡国灭种的悲剧落到中华民族的头上而袖手旁观的。我们早晚会走到一起来的。只是希望大家要早走这一步，多做有功于国家、有功于人民的事情，不要成为国家和民族的千古罪人。”我的一席话说得他们很受感动。我接着说：“我这个人也很重感情。既然在这呆不下，就不必久留，明天我就回去。为了我们的友谊长存，我愿意就此机会同大家诚心结拜，建立生死之交。弟兄们愿意的话，就在此时此地进行。”在场的二掌柜“草上飞”、“水箱”刘胜武、炮头“青山好”、“秧子房掌柜”孙景彬、刘鹏飞，还有刘老二，对我的提议，众口一词，完全同意；加上我和常佐臣，共计八个人，当即举行了结拜仪式。

我们来到草棚外边，有人用手在地上扒个土堆，有人把出岗放哨记时用的香找来一些点着，插在土堆上。然后大家面向南一字儿排开跪下。从我开始每个人都发了誓，表示今后我们都是手足兄弟，有福要同享，有难要同当，不能同生，情愿同死。我还特别强调说：“咱们弟兄之间，谁如有一点坏心眼，就对不起枪（土匪认为枪是最神圣、最宝贵的。用枪发誓是最高的誓愿，最至诚的态度）。”结拜后排行，“青山好”是大哥，我排行第六，大家亲昵地称我为老六。对我也更加随便、更加亲切了，还有人赞许地说：老六是最诚心诚意了。

三、慷慨解囊，站稳脚跟

大掌柜对我产生怀疑，还特别提到了我带的那包东西。说起这包东西，还是我和常佐臣离开哈尔滨以前想到的一个办法呢。当时我考虑，象“庄稼人”这样的小股匪队，远离城镇，在荒僻

的草甸子里流窜，日常需用的衣服、鞋袜等日用品，他们依靠抢劫是可以解决的；而我们来是为了做政治争取工作的，又是共产党员，不能享受不义之财，既不能分东西，也不能分钱。于是买了那些东西，除准备以后自己用外，也可以根据需要送给别人一些。没想到这包东西给我带来了麻烦，对我下一步开展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我想现在正是一个好机会，何不赶快把这个“包袱”甩掉，消除误会，进一步取得大家的好感，让他们出面把我挽留住呢？不然我真的就这样走了，或有其他情况，个人的安危并不重要，革命工作就要受到损失。

那天晚上，趁大家又凑到一起时，我对他们说：“我从哈尔滨出来时，带了一点生活用品。我要回去了，就分给大家做个纪念吧！”说完，我把我使用的一支钢笔送给了刘胜武，因为他是“水箱”，记帐用得着；把怀表送给了“青山好”，他是炮头，也有用处；其他人每人分了一份衣物等。东西虽不多，但触动了大家的心怀，都认为我为人处事仗义。他们听说我要走，都不答应。有的说，你回哈尔滨也没什么紧急的事，就在这多住些日子吧；有的说，你既来了，就“挂住”别走了；也有的要找大掌柜说说。我顺水推舟地说：“弟兄们的厚意，实在盛情难却。我在哈尔滨也住够了，出来换换环境，多住几天也好。”二掌柜也明白我的意思，也说不让我走。他一说话，事情就更好办了。就这样我便暂时留下了。

我虽然留下了，但要完成政治争取工作还需要时间，需要经过一个艰苦的过程。我在哈尔滨做地下工作期间，发展了一些党员，建立了三棵树机车厂和道外小鞋铺两个党支部，还联系着一些进步群众。我离开哈尔滨，他们就失去了领导，长此下去，我

党在哈尔滨的地下斗争必将蒙受严重损失。我怎么也放心不下。想来想去，在当时最好的办法是叫常佐臣回哈尔滨，先把我原来的工作接下去。

常佐臣是我在哈尔滨进行地下斗争的患难战友。他也是农民出身，没有多少文化。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组织纪律性很强。我叫他回哈尔滨，并交给他任务，他表示无条件的服从。但他对我一个人留下很不放心，怕我发生危险。我对他说：“革命总要有牺牲精神，生死关头才能考验出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和党性。我们活着就要在最危险、最艰苦的情况下坚持斗争，咱们不死将来肯定还会见面。”

我说服了常佐臣，布置他回哈尔滨以后，在找到上级党的领导以前，先把地下党支部、党员和进步群众都联系起来。我又给三棵树机车厂的董丽泉、道外小鞋铺的张宝树、姜文山分别写了两封信，交他带上回去接关系。第二天他就由刘老二护送离开“庄稼人”匪队回哈尔滨了。

常佐臣走时，我们相约今后以王庆发家做为联络点。我在“庄稼人”匪队前后共呆了三个月。以后我找到抗联三路军十二支队，辗转战斗，和常佐臣再也没联系上，彼此连生死也不知道。直到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东北光复，我们才又在哈尔滨故地重逢。我们到底还是战斗过来了，成为艰苦战争和白色恐怖中的幸存者。

常佐臣走后，我虽然还没有被大掌柜认可正式加入匪队，但呆得还比较自由，言谈、活动都很随便。因为宋志生在队伍中有威望、有影响，又比大掌柜对我友好，我就一方面积极和他靠近，进一步做他的工作，一方面和弟兄们建立感情。通过拉家

常、谈向往，反复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大家对我越来越熟悉，渐渐地就不隔心了，啥都和我说。很短时间，我对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的出身、经历、对抗日的态度，都了解得比较清楚。大掌柜对我，在感情上也比以前近了，见面常主动打招呼。

有一天晚上，住在南江沿一带的地主老财们，用小船载着猪肉、白面、烟、酒和大烟土等东西来送礼。二掌柜看这是个机会，就把他们先让进草棚，特意把我介绍给他们。然后把我来的经过、来以后的表现以及大掌柜对收留我还没有吐口等情况告诉他们，希望他们到大掌柜面前给我做介绍人，从中说合一下。他们相信宋志生的话，都愿意帮这个忙。有人说，就是老六真把枪带走，我们也能赔得起。

地主老财的话还真起了作用，他们到大掌柜那谈了约半个小时就说好了，大掌柜明确表示态度说留我。他们回来后就吵吵嚷嚷地给我贺喜。按照土匪的规矩，每个人都得有一个号。他们也议论着要给我起一个。我赶忙说：“不用再起了，我已经有个号，叫“瑞麟”。老财们马上奉承地说：“这个号好，瑞麟，麒麟献瑞嘛。”我现在这个名字就是从那时开始叫起来的。宋志生高兴的程度不亚于我。他当时就把一枝“三八”大盖枪发给我，这是他自己的枪，在全队中也是比较好的一枝。

四、宣传抗日救国，扩大抗联影响

从此以后，我在“庄稼人”匪队中有了稳定的地位，使我更有条件做争取改编的工作。为了工作有利，我在任何事情上都严格要求自己，不做越格的事，以免授人以柄。我完全以自己人的身份，参与内部事务，发挥作用，树立威信。